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三重逻辑：理论、制度与实践

李国镇<sup>1</sup> 胡怀国<sup>2</sup>

(1.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求经济适度发展,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李嘉图分配理论可提供以下启发:第一,产业升级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出路;第二,扩大内需是应对出口下降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分别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坚实制度基础和重要制度补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逻辑在于,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而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充分体现,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24.02.004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辉煌篇章。在充分肯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且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年份虽有所下降,但始终在0.46以上的高位水平徘徊<sup>[1]</sup>。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不到30%,收入分配呈现出“金字塔型”的失衡结构<sup>[2]</sup>,与理想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存在一定偏差。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这一政策目标提供学理解释是国内理论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正确认识和把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深刻内涵,关键在于厘清其背后的理论、制度与实践等三重逻辑。

##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3]</sup>。深刻把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逻辑,是顺利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理论上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纵观经济学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编号:20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战略思想史研究”(编号:21ZD080)。

作者简介:李国镇,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研究。

说史,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首次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系统论述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开创性地将二者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而创立了李嘉图分配理论。以分配理论为重点的李嘉图经济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李嘉图分配理论是英国现代化的理论产物,它反映出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面临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互交织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一方面需要实现产业升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国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扩大内需要求广大消费者拥有更强大的购买力,这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现实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意味着劳动报酬有所增加,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和扩大内需。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应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会挤压企业利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过慢则不利于扩大内需。总之,产业升级与扩大内需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两个重要方面,李嘉图分配理论可以为二者提供有益启发。

### (一) 以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凭借明显的成本优势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著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2010年下降了5.9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增速为1.5%,2018年增速则降至0.6%,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于是,国内掀起了一股“产业转移”的热潮,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区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的栖息地。根据新的资源条件,我们应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并进行产业转型,用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可以从李嘉图分配理论中获得一定的理论启发。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要素构成学说,即商品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三个组成部分,并认为三者按照“地租—工资—利润”的次序进行分配,这表明利润是一种剩余产品。李嘉图对工业品和农产品进行了二元区分,认为前者可以在许多国家几乎没有限定地增加<sup>[4]6</sup>,后者则受到土地肥力差异及有限性的制约。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相同,工业品价格因市场竞争及技术进步呈下降趋势,农产品价格因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呈上升趋势<sup>[4]79</sup>。在生存工资假定下,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由食物价格决定,将随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不断攀升<sup>[4]75</sup>。因此,长期来看,工业部门受到产品价格下降与工资上升的双重挤压,其利润趋于下降,工资与利润成反比。为减缓工业利润的下降速度,李嘉图提出了农业改良和进口廉价农产品两种解决方案<sup>[5]</sup>。

随着时代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趋于多样,工业品的价格变化趋于多元。第一,李嘉图将工资上升主要归因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认为维持工业利润的关键举措是控制农产品价格;而我国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来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显然不能通过控制工资成本来促进产业发展。第二,李嘉图将工业品笼统地抽象为一个整体,认为其价格随社会进步而不断下降。但是当前的国际分工已经不同于李嘉图所处的时代,产业间及产业内的分工更为精细,各个国家和地区因分工不同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拥有更大的定价权,其价格随产品所含附加值的增加而上升,进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李嘉图的上述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产业发展问题。但是李嘉图的分析框架可以带给我们重要启发:当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时,提高工业品(包括服务)的价格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没有经济的适度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犹如无源之水,缺少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李嘉图基于工业品价格在社会进步过程中趋于下降的假定,得出工资与利润成反比的结论。这是一种单一式的工业品价格假定,不能直接运用于商品经济高度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但是它所呈现出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能够给我们以重要启发:如果能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来提升工业品价格,那么即使工资上升也不会导致利润下降和经济停滞。对于我国而言,传统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价格趋于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 (二) 以扩大内需化解出口下降压力

除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内部压力,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出口下降的外部压力。为此,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引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较大,国内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比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提升最终消费率有助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sup>[6]</sup>。最终消费率的提升需要有相当规模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这表明扩大内需应综合权衡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李嘉图分配理论对此亦有一定的理论启发。

李嘉图把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认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原因是利润预期;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地租和名义工资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资本积累的动力逐渐消失,经济将陷入停滞状态。因此,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维持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不过,李嘉图认为由食物供给困难引起的工资水平上升是利润下降的唯一原因,而没有考虑资本积累所生产的产品是否拥有足够的需求,他接受了萨伊的生产创造需求学说,并总结道,“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sup>[4]246</sup>。李嘉图还强调指出,购买力是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基本手段,正如他所言,“只要有财力取得,有些人就会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另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葡萄酒以后又会想增添家具或改进其质量。还有一些人便想装饰自己的庭园或扩建自己的住宅。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做这一切事情或其中一部分的愿望;所欠的只是资财”<sup>[4]246-247</sup>。这表明,李嘉图认识到购买力是满足需求的基本手段,从消费视角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否决定了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受全球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出口比例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35.4%下降至2021年的20%左右,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李嘉图的上述分析表明,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提升广大消费者的购买力之上。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相对庞大,这限制了最终消费率的提升。理论上讲,低收入群体的很多需求未得到满足,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中高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于扩大内需大有裨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sup>[7]</sup>,也就是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缓解出口下行压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必要路径。但是,如果劳动报酬增长过快将会挤压企业利润,反而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保持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步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其理论依据。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内部压力,李嘉图分配理论带给我们的启

发是: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不可改变时,提高工业品价格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讲,我国应通过产业升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产业升级可以创造更高的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价格并走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境。针对出口下降的外部压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李嘉图分配理论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扩大内需应建立在一定的购买力基础之上,即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扩大内需。简言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统一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的成功经验表明,制度建设是我国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其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现有的分配体系,为其提供了重要制度补充。

### (一) 根本制度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放眼人类历史长河,无论是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古中国,还是率先开启工业文明进程的近代西方国家,均未能使社会多数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建立起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有着“等贵贱、均贫富”等大同思想,但是在封建制度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加上统治阶级的经济压迫,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率先开启并于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继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通过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却导致贫富差距巨大、社会分化严重。如果说古代中国表现出一种“低”水平的贫富分化特征,那么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近代西方国家所呈现的则是一种“高”水平的贫富分化。古代中国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条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本无从谈起;近代西方国家尽管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无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导致社会分化严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残酷现实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设想在未来最终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需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为前提,由于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该学说曾长期停留在理论设想层面,未能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思想,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先后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最终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据此制定了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这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粮食统购统销等经济政策的重要现实依据。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本温饱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现出有别于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

## (二) 坚实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所有制基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导致贫富悬殊,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完全的私有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财富日益为大资本家所攫取。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全盘否定私有制的积极作用,代之而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这样的所有制安排,使我国在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为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分配制度基础。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然要求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了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束缚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大部分人处于低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逐步强化了人们对分配规律的认识,现行分配方式正是在发展实践中作出的重大制度创新。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助于防止收入分配过度偏离正常轨道,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是改变相对不发达国情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是主要任务,只有经济得到稳步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成为可能。所以,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分配方式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坚持的基本分配原则。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机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具有一定的制约性。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总结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部分。我国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当前,我们立足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核心策略。

## (三) 重要制度补充: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举措,而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具有极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除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分配方式作出总体规定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并且肯定了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三次分配”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初次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还不健全、劳动报酬的占比相对较低<sup>[1,8]</sup>,再分配的收入调节作用不明显<sup>[8]</sup>,第三次分配拓展空间较大<sup>[9]</sup>。在分配领域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将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制度补充。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sup>[10]</sup>,以公益慈善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通过物质援助或公共服务等形式提高低收入者的创收能力,使后者跻身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发展第三次分配意义重大。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成就了一批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是大力发展第三次分配的物质基础;第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次分配起步晚,占GDP比重较低,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因此,第三次分配使财富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流动,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观上有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分配领域所提出的“协调配套”概念充分体现了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之所以强调“协调配套”,是由三次分配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处于基础性地位<sup>[11]</sup>,决定着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空间和重点领域;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力量,需要以初次分配结果为基础,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sup>[12]</sup>;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可以减少对第三次分配的依赖,而科学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对第三次分配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sup>[13]</sup>。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将形成更加合理的分配格局,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深刻的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确立了所有制基础、分配原则及实现路径。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它不仅特别重视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三次分配之间的协调配套性,体现出系统性改革思维,从分配视角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重要制度补充。

###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逻辑

除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有着深刻的实践逻辑。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行动指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并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sup>[14]</sup>,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路径。

####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取得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唯物辩证法,它始终贯穿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要求在观察和分析事物时坚持“重点论”和“发展论”等方法论,其中,“重点论”是指要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论”强调矛盾的动态变化,防止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矛盾分析法,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从而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并积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初,党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认识,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我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我国开始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

列,并于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sup>[15]</sup>。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进入新时代,党根据经济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党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审时度势,从而明确了新时代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及工作重点。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尤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分布着规模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就是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这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低收入农民跻身中等收入群体。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发展的必然选择。

## (二) 坚持“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中协调和共享的内涵。“协调”是对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应对,已在上文进行了论述;“共享”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里将重点阐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从相对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起步,如何使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是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步伐的不断迈进,仅强调效率优先,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开,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无法显著提高,低收入群体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对于提升国内消费水平,促进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将产生阻碍作用。

进入新时代,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党中央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国贫困问题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针对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是拓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渠道,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跨入中等收入群体。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有望在“十四五”期间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sup>[15]</sup>。实现这一目标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避免经济出现“倒退”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拉美地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未能将收入分配保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sup>[16]</sup>。在这一过程中,共享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通过强调发展的普惠性和广泛性,促进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等方式,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三) 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以英国为代表的传统西方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但是它过于强调经济发展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分化的负面结果。马克思在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经过百年艰苦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烙印,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财富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低收入群体的物质财富相对较少,这限制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中央重点强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sup>[17]</sup>,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不断提升党的国家治理能力。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调查显示,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发不同阶层、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sup>[18]</sup>,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sup>[19]</sup>这表明,我们应着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其政策目标的实现直接体现党的国家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辛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深刻的实践逻辑。“道路自信”就是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过了为共同富裕建立政权基础、建立制度基础、建立体制基础以及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四个阶段,形成了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逻辑主线<sup>[20]</sup>,从而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当前,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是现阶段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基础。

以上分析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包含思想、理念和道路三方面的实践逻辑。在思想上,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为我们准确把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方法指引,进而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在理念上,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思路、树立新发展理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协调”和“共享”发展理念的充分体现。在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探索出来的,实践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共同富裕目标”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基础。

#### 四、结 语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正确认识和把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三重逻辑,对于顺利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理论逻辑。经济适度发展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物质前提,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的内外压力。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可以从李嘉图分配理论中得到启发,即通过产业升级来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从而摆脱工资与利润成反比的传统结论。针对出口下降问题,扩大内需成为一项重要的策略选择,而扩大内需要以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基础。换言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统一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中,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第二,制度逻辑。与中国封建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兼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基本条件,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强调“协调配套”方面体现出重大制度创新和系统性思维,为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重要制度补充。

第三,实践逻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包含思想、理念及道路三方面的实践逻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理念上,为适应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协调”和“共享”内涵。在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探索出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实践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实,朱梦冰.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 管理世界,2022,38(1):52-61.
- [2] 洪银兴. 区域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J]. 经济学动态,2022(6):3-10.
-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3.
- [4] 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5] 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全集:第4卷:论文集(1815—1823年)[M].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2-23.
- [6] 史琳琰,张彩云,胡怀国.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论消费的“量”与“质”[J]. 商业研究,2021(6):9-21.
- [7]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8] 文雁兵,陆雪琴.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J]. 经济研究,2018,53(9):83-98.
- [9] 江亚洲,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
- [10] 刘世锦,王子豪,姜淑佳,等.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J]. 管理世界,2022,28(8):54-67.
- [11] 厉以宁.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J]. 经济研究,2013,48(3):4-6.
- [12] 孙豪,曹肖焯. 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4):3-24.
- [13] 梁季. 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J]. 人民论坛,2021(28):34-39.
- [14] 张旭.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J]. 红旗文稿,2022(15):27-30.
- [15] 刘哲希,陈彦斌.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兼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改革,2020(10):33-49.
- [16]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2011(1):2-15.
- [17] 于金富,郑锦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J]. 经济纵横,2022(2):13-18+2.
- [18]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 “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4):80-90.
- [1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09.
- [20] 白永秀,王颂吉. 中国共产党100年经济思想的主线、发展阶段与理论体系[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3):23-32.

[责任编辑 石心竹]